

中性化的技術：一個犯罪的理論

黃維憲譯

爲了真正瞭解少年犯的本源，社會科學家很早就停止從心中的罪惡或身體缺陷兩因素去探究。現在大多數學者都同意，犯罪行爲，像其他社會行爲一樣，是從社會互動過程中學習而得。

蘇壽南 (Sutherland) 的差別交往理論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是上述觀點的典型代表著作。他認爲犯罪行爲牽涉到下列二種學習，(1) 犯法行爲的技術之學習，(2) 違法的動機、驅力、理由和態度等偏好之學習。遺憾的是，有關於這個「學習什麼」的特別主題——正好和如何在「過程中學習」的研究相反——不論在理論和研究上，都很少受到注意。唯一例外的，只有犯罪副文化理論 (Subculture Theory) 的理論，它曾經討論到上述主題之性質。犯罪副文化的特性，由其理論之陳述，它正與崇法的社會份子所持有的價值觀念相反。犯罪世界與守法世界相左，它的規範和從俗社會的秩序正好形成對抗的力量。柯恩 (Cohen) 把犯罪副文化的發展過程，看做爲一個與優勢價值 (Dominant Value)，特別是中產階級的價值，相反的行爲密碼 (A Code for Behavior) 之建構、維持和再強化的事件。

柯恩對犯罪的描述乃從詭辯 (Sophistication) 中完成。他小心的避開過份簡單的解釋，如那些基於「追隨領袖」的原則或「情緒困擾」的簡單通則。同時他也不把犯罪副文化視爲已知之物 (Something Given)，而代之以，對犯罪價值的機能作系統的檢驗，以作爲對低階級男性兒童之社會地位問題的主要解決之道。估不論其理論之貢獻如何，簡就他以其基於競爭或對抗的價值和規範的因素，把少年犯想像爲是行爲的一種形式 (A Form of Behavior) 而論，其理論已有許多的缺點。針對此理論的缺點本質，以下本文將提出另一種可能作爲解釋大部份少年犯罪問題的想法。

把犯罪行爲解釋爲來源於一套偏差的價值或規範是很困難。也就是說，如以罪犯從情境中肯定其犯罪是「對的」爲例，它是理論和經驗兩者俱備的。因爲第一、如果真正有犯罪副文化存在，則罪犯將視其違法行爲，在道德上是正確的 (If there existed in fact a delinquent sub-culture such that the delinquent viewed his illegal behavior as morally correct)。

我們能合理的推測，他將會對其行爲沒有罪惡感，並對被查覺和被判入獄也不會有羞恥心；代替這些反應的，應是憤怒和殉道者之精神。雖然有些罪犯確有後者的反應，然其反應的來源，可以了解的，是基於「被他人遺棄」和「對命運和技巧的欠缺之憤怒」之事實。有許多的證據暗示出，許多罪犯具有犯罪感和羞恥心，而這些態度並不是表現在權威面前的一種矯柔假作的姿態。無疑的，上述的姿態，可能是屬於治療的特性，或是在第一手接觸到罪犯之少年和官員的印象主義判斷下的形式。當然我們要對那些證據加以小心的求證，但是假如我們想要避免，把少年犯想成爲是頑固匪徒的縮型之顯著空型 (Gross stereotype) 時，那些證據就不應該一律被抹殺。

第二、許多觀察者都看到，少年犯對於守法者常常表示出讚美和尊敬。通常真正的誠實者常得到尊敬，但偶而，少年犯也會從那些被其視爲守法，而無廉潔問題的人之中，挑剔出偽君子。在一個謙虛和藹的母親身上，或一個寬恕正直的身上加了兇暴的字眼 (根據很多觀察，前者常和少年犯及成年犯相衝突) 或許是用極端份感 (Rank Sentimentality) 進而把原有形象摒除所致；但最少，罪犯並不必然的把所有法律規範的固執者視爲不道德者此事，是很清

楚的。由另一角度也可以看到上述之事實：即少年犯對於把不法行為嫁禍於，在其直接社會環境（Immediate Social Environment）中之「有意義的他人」或「娛樂和運動界的英雄」時，他將表現得非常憤怒。易言之，假如罪犯是持有與守法者正相反的一套價值和規範的人，則他持有的規範應是一套和守法者相異其趣的規範；從而一個被犯罪副文化之「偏差系統洗禮過的人」，他將在許多事件中，必然會表現出對優勢規範系統的妥當性之認知問題。

第三、許多證據指出，少年犯常在那些是「可以被害」的人與那些是「不可以被害」的人之間，有一個清楚的界限。某些社團裏，因其被少年犯想像為「不是在扮演他們所認可的「公平競爭場」（Fair Game）之角色」，從而遂被他們以不同的理由加以攻擊。通常「被害潛在者」（The Potentiality for Victimizations），可看作是一個少年犯和他人之間的社會距離之函數。（即「被害潛在者」是假少年犯和他人之間的社會距離來決定）。因為我們可以在犯罪世界中，看到那些不明顯的口頭諺，如「不要偷朋友的東西」，「不要以蠻行自毀堂奧」等。這是相當明顯的證據，但其內涵則尚未受到足夠的注意。用想像上地評價行為來攻擊不被其尊重的社會團體這件事，暗示着，像這些「錯誤」（Wrongfulness）的犯罪行為是廣泛的被罪犯所知，超過於文獻上的記載。因為考慮到家屬、朋友、族羣、社會階級、年齡、性別等而限制了少年犯的加害範圍，使我們有理由懷疑犯罪是「絕無德行」這個陳述之確實性。

第四、假如說，許多罪犯都能全部免於受優勢社會秩序的製造者之感染，那是值得商榷的。通常罪犯之家，對其尊重的社會所定之犯罪宣判，都會像真有其事的同意，即使其家庭成員曾參加過不同程度的犯罪行為。這表示着，所謂父母的態度有助於犯罪行為的說法，並不就意謂着那是正面的激勵（Positive Prodding）。不論父母範例的影響為何，所謂社會化的非法行為模式能使使犯罪可能是很罕有的。此外，如瑞地（Red）所說，在某些充塞罪犯的社區，將毫無保留的提供出為小孩學習的犯罪行為模式之想法，在他的研究中是絕然得不到證明。

眞像是，小孩如果受到父母、教師或法律執行者對其罪行加以處罰——如許多冷嘲式的觀察者所看到——它的結果可能只是暗示着，此小孩以後必須加

倍小心以免再次被捕。雖然處罰是一個使小孩內化從俗性要求的公平和最大的可能途徑，但不是說從俗性的要求不會產生反效果。事實上，我們將很快會看到，對於瞭解「認知如何中性化內部和外部的從俗性之要求」這件事，可能是開啓犯罪行為之鑰匙。這是說，一個人把從俗要求之合法性完全否定而代之以全新的規範系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此理由是，因成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從而小孩和少年犯必然的也是生活於和成人一樣的社會環境中。不論罪犯陷入犯罪行為多深，或不論其犯罪參與勝過於與守法者之關係有多少，他將不能逃脫其對自己的偏差行為之詭辯。總之，吾人如想要解答從俗性要求之謎，則罪犯就不能因其為價值和規範的疏離者而被忽視。

簡言之，從理論上說，把少年犯罪看成是由偏差副文化的規範和價值所產生的一種行為形式，且其形成過程是和守法行為之基於大社會的規範和價值而形成一樣，則會引起很多的疑問。事實上，犯罪世界乃嵌在從俗世界之中，它不應被單獨的過份強調，也不應把它與成人另一種生活方式的社會化等量齊觀。而是，在依照大多數守法者的標準下，當少年犯違犯了大社會的禁令而常常有罪惡感和羞恥心時，至少其犯罪行為應被視為乃受優勢社會秩序所控制，從而對其偏差行為如何的區別正當與不正當的目標加以探討。下面我要談的，就是我對此種犯罪行為之顯著的不合理事實之解釋。

如同克恩（Mavis Cohen）曾說的，在人類行為中最使人感到迷惘的，是為什麼人們會違犯他們所信賴的法律。這個難題，就是和當我們嘗試去解釋，為什麼犯罪行為會不受從俗習慣的約束而產生，所遭遇的問題一樣。此問之基本核心乃在於下列事實：即假如社會規則或規範不採取強制型的形式（The Form of Categorical Imperatives）時，它對於型模價值行為的功效將會很少。再者，即使價值或規範能作為行動的「適宜指針」（Qualified Guides），它也會因時間、地點、人物和社會環境等而受到適應的限制。譬如說，在道德上，懸為禁令的殺人，並不適用於殺敵人於戰場。同時在戰場中俘虜敵人也不算犯禁。相同的，雖然在正常情況下，私人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如在社會真正需要時，有關稀少物品之統籌和統配，也會得到大多數的同意，換言之，社會規範系統，如韋廉（William）所說的，是具有適應性（

Flexity) 的特性。它並不是由一套與所有情境僵化在一起的死規則所組成。事實上，此適應性是一個整合的刑法 (Criminal Law) 之一部份。它是為測定「對犯罪行為之自我防衛」(For Defenses to Crimes) 的辯護理由，如幼穉，不得已 (Necessity)，不健全、酒醉、被迫性及自衛等，而設。是故假如罪犯能證明他沒有犯罪意圖 (Criminal Content)，罪犯對其犯罪行動便可以藉自我防衛之理由，規避道德上的「有罪感」，因此也避過了社會的負面制裁。我們所要提出的是：大部份犯罪行為可以說是導源於「何者是對犯罪行為的自我防衛」之本質地誤解而衍出，因而把犯罪行為辯護成是正當防衛乃成為犯罪的專用品，但不為法律系統和大多數社會所採用。

那些辯護理由通常被稱為理由化 (Rationalization)。他們被視為是在偏差行為產生後，作為自責之保護和譴責他人的理由。但它亦有理由被相信，因為有這些東西已先存在，從而造成偏差行為或使偏差行為的發生才有可能。蘇壽南只是略為提到此觀念，其他的著作也忽略了如何用社會學理論來解釋此關鍵。在社會環境中，不受「內化的規範」之指導和不能從俗於社會大多數的人是中性化 (Neutralised)，倒轉成為先已偏斜的人。社會控制，在作為檢驗和禁止偏差情緒模式兩方面是無效的，個人能够輕易的參與犯罪行為，而且其自我意象並不受嚴重的傷害。從此意義而言，罪犯都是持有餅干而自食者。因為他既受到優勢規範系統之約束，但仍然把「既使不是對的，違法是可以接受的指令」視為正當。因此罪犯所站的位置不是與守法社會相抗衡的位置，而是類似於抱歎式的失敗者，他常常受到自己眼中應得以上的責備。我們稱呼這些偏差行為的辯護為中性的技術。我們相信蘇壽南的「犯法偏好」的意義 (Sutherland's "Definitions Favorable to the Violation of Law")，即以此些技術為其構成的主要基石。少年藉著這些技術的學習，勝過於培養對優勢社會之道德強迫性、價值和態度的敵視，而變成罪犯。

在分析這些技術時，我們發現可以適宜的把它區分為下列五種型式：

1. 責任之否認 (The Denial of Responsibility)

從罪犯為其犯罪行為而主張自己缺乏責任而言，他的對自己和他人的不承認，可以嚴格的被看為是其本身抑制影響力之生效 (Is sharply reduced

in effectiveness as restraining influence)。正如荷馬 (Holmes) 法官所說，即使是狗也知道，它是自己跌倒或是被絆倒，因此在現代社會中，已可以小心的，把如喪失責任感的那些無心傷害和有意的傷害加以區別。然而作為中性化技術的責任之否認，其擴張，比通常所謂的偏差行為是「疏忽的」或某些相似於個人責任之否定的要求 (Claims) 為大。他可能宣稱，其犯罪行動乃因外在於個人控制力之外在力量，如缺乏雙親之愛，壞朋友或居住貧民區等所致。事實上罪犯是以「撞球臺上之球」(A Billiard Ball) 來類比其自身，如同拾上之球，他把自己視為是無助的，而且隨時可被迫進入新的情境。從動機心理學觀點來看，這種朝向自己行動的取向 (This Orientation Toward One's Own Actions)，可能是一個深度的自我疏離之表現。但更重要而必須加以強調的事實是：責任的解釋是文化的建構物，它不僅僅是特別的信仰 (Idiosyncratic Beliefs)。其相似性有如，在罪犯對這類不法行為的辯護之模式的假定，和社會學的參考架構或人類法理學 (Humane Jurisprudence) 之間的相似一樣是很明白的。我們在此處所考慮的不是這個取向的妥當性，而是它在連繫違犯社會規範的歪斜責備之功能 (Function of Deflecting Blame)，和它和特殊人格結構的相對獨立性。從學習視自己的行為，為奉令 (Acted On) 而行多於自主而行 (Acting)，罪犯準備了一條遠離優勢社會規範系統之偏差路線，同時也不必去攻擊優勢社會規範系統。

2. 毀損之否認 (The Denial of Injury)

第二個主要的中性化技術，集中於在犯罪行動中牽涉到的毀損和損害。由於刑法很早以前已把「行動的本身是錯的」(mala in se) 和「行動是不合法，但不是不道德的」(mala prohibita) 兩類行動分開。因此罪犯也可以利用上述區分的概念來評估其「不法」(Wrongfulness) 的行為。進而，罪犯可以把其不法行為轉向為考慮「是否」有任何人 (Anyone)，在此次偏差行動中清楚的受到傷害的問題，並可從許多不同角度來解釋此問題。舉例而言，發行 (Vandalism) 可能被罪犯簡單的界定為是一種災禍。總之，它可能被主張，受害者可以承受此財產的毀損。相似的，竊車犯視其行為為借用行為。幫會械鬥則被視為是，經過兩造一致的自願解決問題的方式，而不考慮到對社

慮之損害。

我們並不暗示毀損之否認，這種中性化的技術牽涉到一個明顯的辯護（An Explicit Dialectic）。而是，通常在罪犯的模糊感覺中，他以爲他的罪行並不會真正的引起很大的損害，如不論其違法之事實。正如個人和其行動之連繫可能被責任之否認所中斷一樣，其行動和結果之間的關連也會受到毀損之否認而中斷。因爲有時社會也會對像逃學、乖異的行爲等加以同意（agree with）。這些措施，全然再確實了下列的觀念：即藉着對規範的斟酌，社會控制被罪犯所中性化此事，是一個規範之平常實踐的延伸，而不是一個完全否定的舉動。

3. 被害者之否認 (The Denial of the Victim)

即使罪犯承認其偏差行爲的責任，並且也承認他的偏差行動牽涉到毀損和傷害，然而因道德上之自我和對他人之憤怒，他可能藉着，堅持在那時的環境中，其毀損是沒有錯，來中性化。毀損可能被宣稱不是真正的毀損，而是一種正確的懲罰和報復。依附此精細的鍊金術（By a Subtle Alchemy），罪惡搖身一變而成爲「替天行道者」，受害者則變成「罪有應得者」。有關對同性戀者，擬同性戀者和少數團體等之攻擊事件，就是在「離開此地」（Out of Place）的旗幟下進行，蠻行是對不公正的教職員的一種報復方式；偷竊自「不誠實」的店東也是一種報復。以上這些罪行，在罪犯的眼中，全部都是屬於痛擊犯人的行爲。誠如歐威爾（Orwell）指出的，被大眾所崇拜的犯罪類型，因時間的推移，時有改變。強盜不再是英雄，但胡得（Robin Hood）的行跡和其後半世的再生，如扮演固執的偵探以尋找法律外正義之想法，仍然深深捉住百姓的心裏，因此罪犯可能把自己比擬爲是在扮演正在進行的戲劇之中的角色。

否認被害者之存在，且把他變成是「傷害應得者」，那是我們前面提過的一種極端形式的現象，即罪犯在其犯罪行動時，已對正當與不正當的有清楚的瞭解。然而，進一步來看，可知受害者之存在而却被告否定，乃因罪犯是藉着其犯罪行動時之社會環境而賦以受害者不同的意義所致。從此範圍來說，受害者在罪犯眼中，是被視爲實體消失，視而不見或只見模糊影像者（如在犯罪行

爲中常發生的財產毀損案），也就是說罪犯對受害者存在的知覺是很微弱的。假如內化規範和對他人的反應之預期，能作爲行爲之指導者，則在上述情形中，她們應該有某些作用才對。因此我們可以說，生成於行動中的對受害者知覺減低之中性化的技術，必定在「決定犯罪過程中」扮演着重重要的因素，否則罪行無法進行。」

4. 定罪者之定罪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Condemners)

第四種中性化的技術爲對定罪者之定罪，也就是如麥克勒（McCorle）和寇恩（Korn）曾經說過的「反對者之反駁」（A Rejection of Rejectors）。罪犯轉移其對自己的偏差行爲之注意力，到那些不贊成其違法者之動機和行爲。他可以宣稱，那些宣判其罪行，是偽君子，偽裝的偏差者或是基於個人怨恨的假公濟私者。當這種對從俗世界的指向——即針對那些執行或表示大社會規範的工作者所生之態度——變成爲諷刺的犬儒主義（Cynicism）時，它是很值得注意的。舉例而言，警察可能被說是腐敗的、無恥的和殘忍的人，教師則爲徇私者；而父母則爲吹毛求疵者。稍加擴大，則成爲從俗之報酬，如物質成就，乃因幸運和異稟（Pall）所致，幸運之神大都袒護着守法者。這種猜疑心的效力，使附着於違法規範上的負制裁，偏斜或轉向的功能並不很重要。事實上，罪犯，在其自己的偏差衝動和他人的反應之間，經常以「自問自答」的方式來轉變其對話的內容，從而藉着對他人的攻擊，罪犯很輕易的就能把自己的錯誤行爲壓抑住或全然忘掉。

5. 高度忠貞之吸力 (The Appeal of Higher Loyalties)

第五也是最後的技術是，爲了符合罪犯所屬的小團體如同胞、幫會或友誼羣等的規範要求，罪犯的內部和外部的社會控制可能被中性化，從而犧牲了大社會的規範要求。罪犯並不拒絕優勢規範系統的命令，只是失敗的去做它，此種吾人是必須知道的。恰當的說，罪犯可能視自己是處於一個必須解決的困境（Dilemma）中，不幸地是他捨守法之途而就違法之道。施脫夫（Stouffer）和吐密（Toby），在他們所做的「個別要求和普遍要求」（Particularistic and Universalistic Demand）的衝突，即友誼的要求和通常社會義務的要求之衝突之研究中，曾對此情境的一部分加以探討，其結論爲：如果想解答如

何在角色衝突中，於困境中選擇此一個或那一個之決定，可能要先瞭解不同人之不同先置條件 (Disposition)，才能得到答案。然而，從我們的目的而言，其重點在，對某些規範之偏差可能不是因對此規範的拒絕，而是因為有其他規範存在所致，於此兩者中，其壓力較大或牽涉到忠貞者的一個，勢將被優先遵行。事實上，此兩組規範，在我們的困境和角色衝突裏，都同具意義也是可以被相信的。

有關友誼的要求與守法的要求之間的衝突，或其相似的難題，很早以前就被社會科學家和文學家認為是基本人類問題。假如少年犯解決此困境的方式，經常固執於他必須「經常幫助夥伴」或「絕不與朋友爭吵」，既使因此而使自己在優勢社會秩序中遭到生活的危機時；他的決擇過程，大致而言，仍然和守法者在「二擇一的過程」裏相似。或則說，從另一角度而言，罪犯是特別的，他具有下面的認知：他知道自己是代表其所屬的小型團體，在扮演著違犯社會的規範之辯護，然而它是程度的問題而非類別的問題。

由「我不是這意思」，「我不曾真正的傷害到別人」，「他們自作自受」及「每個人都找我麻煩」等格言及其變形，我們可以假設，少年犯已有犯罪準備。這些「情境定義」代表着，它是一種優勢規範系統之越軌或風暴，勝過於相反的意識形態；它是從原有社會思想模式中擴充而得，而不是無中生有的一些東西 (Something Created Do no Vo)。

如我們前面提過的，個人對來自其自己之內化價值和從俗他人的反應兩方面之壓力，中性化之技術可能不是一種很「够力」的「保護傘」。因此少年犯在其偏差行為被發覺時，常常會表現出，有羞恥心和罪惡感。再者有些罪犯可能疏離於從俗世界，中性化之技術對其便不生作用。然而我們必須對此技術加以討論，乃因中性化的技術減低了社會控制的效率，而且為大部份罪犯所共具，這對社會來說是很危險的。目前有關於園地的實證研究雖然頗為零碎，但瑞地，科瑞塞 (Cressey) 和一些其他的作者，已經提供出一套有意義的材料，這些材料澄清了這個理論的思路，也加大了它的支持證據。在此以後，下列兩個研究似乎還有待求證。第一，要加強對中性化的技術之差別分佈 (Differential Desirability) 研究，以增加更多此方面的智識；進而，可以年依

齡、性別、社會階級和族羣等來加以個別研究和闡釋。當然在作此研究之前，它必須以下列理由為假設：即偏差行為的辯護，可以從社會分組中，每一分組內，那些對一般社會理想和社會實作 (Common Social Ideals and Social Practice) 的扮演有明顯失調者中去瞭解，是很容易的。同時，它也可以由另一觀點來研究，即，因使優勢規範系統彎曲的習性——只要不是折斷——貫穿於 (Let Across) 我們天然的社會類屬 (Social categories) 中，故這可以從社會集團 (Social Circle) 中最初的社會互動模式去探討。第二，要加強對中性化的技術之內部結構之研究，如態度，信仰系統及其與不同型式的犯罪行為之間的關係。即某類中性化之技術，可能被某類偏差行為所常用，而多於他類的偏差行為。舉例言之，如我們前所提出的，財產毀損犯罪最常使用的技術，便是傷害之否認。因有關此類的研究成果，仍然很少，故其相關性質有待吾人加以釐清。

無論如何，中性化的技術，已對少年犯罪研究的理論瞭解之擴大和系統化，提供出一條有希望的研究路線。一當中性化的技術，其來源和結果，有更多的了解時，吾人相信，有關少年犯之特殊性和其乖離規範系統兩方面之一般現象，便可以得到解釋。

本文譯自：Society, Delinquency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Harnwin

L. voss (ed), 1970, B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中

Gresham M. Sykes and David Matza 所書之

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 A Theory

of Delinquency